

我的学术自传

刘毓璜

一

我祖籍安徽省巢县（今巢湖市），1910年10月出生于一个地主大家族的书香门庭。祖父系科举出身，清朝同治年间拔贡，做过李秉衡的幕僚，后投李鸿章属下，帮办洋务。晚年居家养静，琴书暇日，兼领一些修志、订谱工作。父亲举秀才后，即无意进取，转好新学，在两江优级师范首届毕业。这两代人的思想差距，很早就反映在我童年的心坎上。

记得我五岁时，祖父亲自为我启蒙《三字经》外，又读《四字经》，一上来就讲“经书暇日，子史须通”。其实“子”是陪衬，里面讲的全是“史”，多采多姿，有较大吸引力。六七岁后，在祖父督教下，依次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只管死记硬背，不给多讲解，有时连圈定的几行小注也要背。下午的塾课，先练写大小字，然后读点韵文，从《楚辞》到《昭明文选》，随意挑着读。余下的时间，就学着点《纲鉴》，查辞典、韵书，轻松多了。不过，当轮到要做作文的一天，碰上个难题目，马上又会紧张起来。

当然，在晚饭过后，还得有一段时间，在灯下读唐诗、古文，篇篇背熟过堂。在我们家里，祖父算是个大族长，很有点威

信，什么都说了算。到我十岁那年，唐诗、古文是早学完了，晚课没得学。他居然把心一横，要领我向八股、试帖再努一把力。正当这时，父亲从外地休假回家，听说有这回事，就委婉地和他商量：外边早就不兴这个，给别人听见，说闲话。这才打消了祖父的念头。

父亲读两江师范，投向新学，主攻文科，旨在教育救国。毕业后，就应聘去北京教书，平时不常回家。但这次休假回来，就不想再回原单位。他生性爽直耿介，对当时政治局势和社会风习感到强烈的不满，在一个偶然场合，竟为太虚法师所宣讲的佛法所打动，决心远离这座是非之地的大城市，辞去女师院的职务，回到地方上去办教育。当时，父亲年纪才三十出头，办事很讲效率，不到半年，就组好一套教学班子，解决了校舍和设备问题，挂起“明强小学”的牌子，公开招起生来。就在这种条件下，我才第一次跨出家塾的门槛，转入新的教学环境。

我确切意识到，父亲这样做，对我真是一次拯救。上小学三年，接触面较广，学到许多新鲜知识，不但眼界开阔得多，而且从老师们的讲解中，也会帮助理顺思路，多少懂得点做学问的方法。特别是父亲上国文、历史课，我最爱听。因为他上讲台时，从不照本宣科，也不照搬前人陈说，而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倾注到课文中去，潇洒自如地评述前言往事，赞扬和肯定好的，谴责和摒弃坏的，在我幼稚的心灵中，不自觉地滋长出自我辨别是非、利害、美丑的要求，逐渐领悟到一定要把书读活，才会有较大的受益。

小学毕业后，父亲商得祖父同意，送我去芜湖萃文中学上学。这是一所教会学校，据说是英国人办的，还有点小名气。洋人办的学堂，对祖父来说，反感并不太大。父亲走这一着，显然是出于不得已的。我满怀新的喜悦，自幸上进有门。不料一跨进学校，就看到墙壁上挂的清规戒律，连吃饭和睡觉的仪式也给订得

死死的，叫人感到窒息。上课吧，只抓紧外语一门，别的都敷衍了事。无可奈何，只好悄悄溜到亲戚家，借来一部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一部《十八家诗抄》，似懂非懂地自学下去，希望从中得到补偿。想起父亲过去在讲坛上，曾经不只一次地提到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，第一个发动鸦片战争、侵犯我国神圣主权的就是英国人，我不禁在心头燃起愤恨之火，巴不得早一天跳出现实的环境，结束这种封闭式的生活。等到读初二下时，听说上海租界发生“五卅”惨案，枪杀我国工人。我愤怒地抢在示威人群的前面，亲自在英国文化侵略者（指校长华尔敦）的头上，找到了反击一掌的机会。

我抱着满腔激愤，直奔亲戚家，诉说自己出了事，已被挂牌除名了。有一位表叔很同情我，愿意介绍我去一所私立工业专科学校，在预科试试。我当然喜出望外，马上卷起行李，跟他一路走。这所学院离市区较远，顺江堤走去，约有三十多里。听表叔说，校址在珠儿山广福矾，环境幽美。校长洪竹荪，系上海大资本家，主张实业救国，办学很认真，师资队伍也比较强。我心里想：在萃文一年多来，天天泡在洋文里，数、理、化教得马虎，等于没学。眼下这个学习机会，正好让我补缺，向全面发展迈进一步。我真是太幸运了。

工院预科班上的课，主要放在数、理方面，足抵高中程度，限两年学完。由于我数理底子薄，差距太大，学起来很吃力，没昼没夜地拼着去赶，赶不上来时，只好向师友们讨教。即使这样，有的还是食而不化。我耐着性子跨进本科，发现各门课用的全是英文教材，新课名目多，作业要求严，还要挤出时间，练习用仪器画图。我费了很大的劲，几乎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连周围一派好山好水也顾不上看一眼。这年寒假，我回家过春节，恰巧碰到北伐军过境，有一位旅长借住我家，热情宣传国民革命的大道理。祖父知道了，二话不说，马上把我找去训话：现在外边闹得

实在不得了！学校是闹革命的窠子，你过年以后，就只管留在家，多读点古书，别想再出去上学，跟别人学坏，也来造反！我心里抖了一下，暗自思忖着：祖父是一家之主，从来说一不二，现在对革命反感这么大，比对洋人还厉害。他决定怎么干，任何人也阻挡不了，还是默认下来为好。

就这样，我一连在家辍学两年。在这段日子里，原来学到的一点理工科知识，很自然地生疏了，却在无意中获得了一个相当优越的自学条件。我家院后有两座小楼，开间比较宽敞，里面四壁琳琅，满放着上辈们收藏下来的线装书。大约因为年代久了，家里人多手杂，有些书被翻检出来，没有及时还箱、上架，虫蛀、鼠咬，有些还零落散失，不明去向。我当时自告奋勇，愿意利用这空闲时间，把它们尽快清理一下。真正找不着的，就登记备查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动议有利于重整“书香”，首先得到祖父的支持。至于父亲，每天一大早就出门走访，找人联系磋商，为地方上筹办中学而奔波。有时抽点空，也喜欢来这里看看，给我以亲切的指点。我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，在进行彻底清理的同时，留心察看到传统文献典籍自然存在的类别，如饥似渴地探求知识，产生了“经书暇日，子史须通”的迫切感。但必须承认，我的这些感受不过是朦胧的，出于自发的，不可能接触到目录学的边缘，甚至连经、史、子的概念也分辨不清。唯一的效验是：在这优雅的小天地里，开始触发我对于泛读古书的爱好，滋长了我在专业主攻方向上去理就文的心底潜流。这对我的学习，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转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：这次被迫辍学在家，丢掉的什么，得到更多的什么。在这个小天地里，读书的时间很宽裕，环境相当宁静。祖父年岁高了，看我比较听话，同古书打交道，就不多管我了。父亲却说这样守在家里，决不是办法。读古书时，我懂得留心揣摩，把握它的意蕴，不能操之过急。为今后计，只有下决心跳出

塾课格局，在经书之外，多读点史书、子书，从自学中开阔眼界，增长活的知识。父亲亲自指点我：《左传》这部书有文、有史，有人情哲理，读起来很受用，很有兴致，要学得细致一些，领会得多一些，再准备下点功夫，向《史记》纪传部分学下去。我细心聆听这些教诲，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统统把它兑现，尽管在自学过程中还碰到不少困难和疑惑，也冲淡不了我第一次享受知识营养的自我满足。

在这个大家族中，按辈份说，我是长房长孙，负有特定的“承重”义务。这不可避免地要直接影响到我的命运安排。因而，祖父一个劲儿要我留在家里，是早已铁了心的；父亲却认为现在时局变了，只要是个年轻人，就得出去走走，学点新东西，跟上形势。他暗下鼓励我：现在必须注意，要抓紧时间复习外文和数学，没有这两门，就考不上大学。就说文科吧，也得到外边去，才学上路子，象这样死啃几本古书是绝对不行的。无疑，在这两代人意见之间，我对于前途的抉择，自然是站在父亲一边。不过，在祖老太爷面前，父亲怎么也拗不过他。如果他当真发起脾气来，我这个做小辈的怎敢说半个不字？只好表面虚与委蛇，不动声色，暗自和父亲商量，做好必要的准备。终于在一个春节后的晚上，背起一肩行李，离开这道封建的闸门，独自跨上新的征途。

二

现在想起，离家的那年，我刚满二十岁，没有出过远门，不懂得人情世故。当轮船刚靠上南京下关码头，我就挤在人群中，带着父亲的介绍信，迳奔中正街（今白下路）安徽公学，去找事务部主任刘治伯，要求插到毕业班旁听一些课，准备在暑假报考大学。经学校考虑，破例接受，使我在短短几个月内，能够做好备考复学，满怀豪情地步入试场，终于在中央大学发榜时看到了

自己的名字。

在当时，中央大学是个“名牌”，拥有8个院、50多个系。我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家中，先去看望父亲。父亲恰巧不在家。听母亲说，祖父近几天来，常常查问我，一提起考大学的事就冒火，等会见到他，要当心，沉得住气。果然，祖父一听到消息，立即把我找去问话。他先是扳起面孔，讲了一通“出必告，反必面”（《礼记·曲礼》）的大道理，要我当面承认错误，然后把话一转，追问我考的什么大学？打算学哪一行？真没想到，当我如实地说到报考中央大学中文系时，他的神态反而平静下来，说“学中文是条正路，可家里收藏的古书，够你学一辈子，何必外求？有不懂的地方，只管来问我。几千年来，不知出了多少大文豪，大学问家，可都没有上过洋学堂，这才是千真万确！”他坦率地向我宣告：以后你们年轻人不准再谈上大学的事，凡是不听话的，一切费用，家里决不负责。我默默地转身离开了他，再去同父亲商量。

父亲一回家，听说我考取中大，非常高兴，夸奖我榜上有名，得来不易，在一定意义上，算是接上他的班了。他委婉告诉我：对待家里的小辈们，祖父总归说要守，怎么能守得住！他的主意一定，就扳摇不动，犯不着同他去争。现在离学校开学，还有一点时间，不如转托旁人出面，向他好好疏通一下，先拿出一部分钱，办理入学手续，以后再说。可是，正好相反，祖父不但坚决不答应，拒绝承担任何义务；反而异想天开地倒回头来，企图利用这些人说动我跟他做学问，顺便管点家务事，甚至不惜以重金作诱饵，来拖我的后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得从父亲那里临时筹措一笔旅费，提前到南京去，寄住在安徽公学，等待去中大报到注册。

事后才知，我这回又一次不告而别，引起祖父的赫然震怒，同父亲大吵了一场，声称要和我断绝关系，家里不许再寄一文

钱。父亲看到事情闹僵了，手里又没有经济权，只好亲自去南京，同刘治伯商量，设法介绍我在安徽会馆办的小学（即登隆巷小学）当老师，月领工资24元，还有个下榻之地。这就决定了我一跨进大学之门，就不得不走上半工半读的路子。在漫长的四年当中，不知要划出多少时间从事辛苦的园丁生活。

我报考中大中文系是完全出于自愿的。一因从小在家做塾课，喜欢读古书，多少有点底子；二是这个系根基厚，专家学者，名流辈出，有较大吸引力。按系里规定，一年级必修的有三门基础课（各体文选、文字学、中国文学史），要求比较严格。余下的时间，可选修或旁听别的课程，不受限制。出于强烈的求知欲，我感到学好本系的三门课还不太吃力，不愿放弃每一个机会，去听著名教授讲课和学术报告。其中最感兴趣的，有沈刚伯讲授的希腊、罗马史，东方美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。到一年级下学期，当我继续选修沈刚伯新的法国革命史以后，这才明显地意识到：我所热烈向往的，决不是单纯的兴趣主义，而是由新学带来的“五四”精神。想想过去，一直泡在古学里面，简直喘不过气来。如今所迫切需要的，倒是在新学领域里多补点课，争取能换换脑子，赶上时代。我不禁想起父亲往日的教诲，觉得非常有理，就连启蒙时期背熟的那两句话——“经书暇日，子史须通”也确实大有道理。

这年暑假回家，我迫不及待地向父亲抛出自己的打算，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我准备在秋季开学后，从二年级起，就申请转历史系肄业，重新安排学习计划。父亲沉思了半晌，原则上赞同我的想法，认为一味去钻研古学，置新学于不顾，当然不妥；但必须注意，不能走到另一极端，把“五四”精神片面化。本来，古学所研讨的，是中国传统文明，其中也有精华部分。中大在这方面力量很强，有些课还得学，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，我看还是兼筹并顾为好。父亲一番话，蕴含着许多经验和哲理，进一步加

强了我对于选择未来的信心。

转系后的三年中，我紧沿着既定的方向，一面按照实际的需要，有重点地选读文史两系开设的主要课程，逐步进入高层次的学习；一面抓紧时机去听外系专家的课，从多头并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。我还拨出一部分精力，对英、德两门外语跟班深造，为攀登未来的理想而孜孜不息。我聚精会神地走过每一段里程，回味每一位师长的殷勤教诲，感到自己的学识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，仿佛不论古学还是新学，都会在脑海中得以消化。就这样，我坚持不懈地埋头攻研，在大学四年中，一共读了176个学分（超48个学分），赢得了安徽省教育厅设置的三次奖金。

令人特别痛心的是：当我埋头苦读之日，正是国难方殷之时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沦陷、平津告急，大批流亡青年陆续南下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出兵抗日，收复失地。请愿不成，继之以游行示威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共鸣。我激于爱国义愤，也曾不只一次地丢开书本和课堂，踊跃参加到这个行列中去。在斗争激烈的游行中，我深切地领悟到自己肩上推脱不了的历史责任感。

1934年秋天，我从中大毕业后，经友人介绍，去天津南开大学任经济所助研，兼管图书。这个研究所编制约30人，经费主要由美国罗氏基金补助。所长的职务，由经济系主任兼领，自副研以上，多半也是兼职。所内的工作，侧重于地区经济调查，除发表系列专著外，还有一份学术刊物——《政治经济季刊》，向国内外发行。由于我的研究任务一时还定不下来，只在图书馆主持一部分工作。馆内所收藏的，几乎全是专业用书。每天来这里借书、查资料的不算太多。却规定要及时办理好订购、交换手续，向国内外直接挂钩。管理的方式，多半仿效美国，连分类和编目方法，也照搬国会图书馆的。开始心里没把握，经过一段学习和

锻炼，又觉得这项工作比较适合个人爱好。这里环境幽静，人事单纯，学术空气浓，工作越做越有劲，不由得产生依依眷恋之情。可是在当时，由于日寇的攻势直逼整个华北，在这个小天地里，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

正当这时，祖父开始回心转意，自愿从家里拿出钱来，支持弟弟们上大学。我有三个弟弟，天资都很好，个个勤奋上进。他们在地方上读完初中，先后升入扬州中学肄业。当我去南开那年，二弟已高中毕业，考取清华大学。这时他毅然决然地走出课堂，冲破重重阻难，在敌人刺刀丛下，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，亲自参与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在斗争中，他因为目标暴露，曾经来南开短时“避风”。在促膝交谈中，向我叙述这次运动中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，讲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抗日、挽救民族危机的原因，使我从心灵深处第一次接触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，感受到中国的未来只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，光凭古学和新学上的经验根本行不通的。

就在下一年秋天，当着三弟、四弟同时考取清华、南开，联袂北上的时候，形势更加紧迫，我们同胞弟兄不但没有心肠欢聚一堂，而且必须立即从实际出发，重新考虑和抉择各自的去路。当时，二弟和四弟都参加了“民先”（民族解放先锋队，后来两人都加入中国共产党），三弟是地下党员，独我无党无派。1936年初夏，我们相约结伴南下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经过反复磋商，最后决定：他们三人提前离开家，奔赴国难，取道武汉或长沙，接上组织关系，北去延安。家里的一切，完全由我照管，保证及时做好准备，向安全地带撤退。我心里七上八下，一时竟拿不出主意。回家以后，我们把问题照实摊开了。没有料到父亲一点也不惊慌，反而在精神上给以积极鼓励，认为历史是讲因果的，有头有尾的。国民党政治败坏，荼毒生灵，开了个坏头；日寇狼子野心，侵略我国，蹂躏人权，也不会有好下场；将来的结局还得靠

共产党来收拾。这个大义凛然的教导，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，大大增强了我对当时形势的洞察力，进而反省到一个历史工作者应如何正视历史现实的问题。

从“七七”事变前夕，经过八年艰苦抗战，除了拨出一部分时间，卷进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，我被迫抛妻别子，孑然一身肩负国忧家难，依靠一个普通中学教师的月薪收入，护持着一家五口（父亲、母亲、小弟、大姐、外姪女），展转跋涉于巴山、蜀水之间，在生活磨难和政治迫害下，根本没有条件去做任何学问。

堪以自慰的是：我在百忙中能够找到地下党，接受革命教育（虽然不到五个月就失去联系）；又设法借到一批古书（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），在温故知新的基础上，经常亲聆到父亲有益的启迪。他语重心长地指出：读书贵在选得精，学得透，好比学佛、参禅一样，在思想意识上，要和“贪”、“嗔”、“痴”绝缘。“贪”是穷搜滥采，浅尝辄止；“嗔”是气量狭小，涵养太差；“痴”是胶着一点，着意入迷。掌握住这个要领，就满可以开阔思路，深入研讨，做好学问。先秦诸子中，从哲理方面说，儒学也是“子”。儒家八派，孟、荀各具优势，互见短长，说不上谁是正统，但如孟子辟扬、墨，荀子斥名辨，未免意气太盛，胸襟狭隘，都不足为训。这段话，使我铭记在心，更加激发了我研习诸子之学的爱好。与此同时，我还以余兴的方式学做古典诗词，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感，填补偶然闲暇的空白。这样自学的方式习以为常，在抗日胜利后，直至全国解放，基本上保持了下来。

三

建国以后，我有幸返回母校母系，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，重

新拾起旧的专业。从长期工作实际中，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，唯有坚持走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的道路，才有条件做好学问，增长知识和才干。这在我的生命历程中，的确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确切领会到：马克思主义是长期以来人类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，人们智慧、思想发展的最高结晶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密切结合起来，才有可能端正教学和研究的方向，发扬史学前辈们的开拓精神，从批判古学和新学的长期艰苦实践中，逐步提炼出更高的学术质量，不断扩大新的研究领域。舍此而外，就无所谓开拓。

我满怀着兴奋的激情，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努力把握其中的要旨，结合有关文献、文物资料，仔细寻绎我国古史发展中的规律动向，从而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奴隶制结构形态。我相当自觉地认为：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指示，应当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，不分任何民族和地区，必须经历同一的轨迹，尽管不可能做到整齐划一。所谓“五阶段论”，它的逻辑程式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早已定型，再经恩格斯得力补充，把原始社会划出为独立阶段，而趋于完整。这个科学论断又在列宁著作中加以引伸，发展到体系化。因此，在一元论的指导下，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划分，只可能表现为多型的，决不是多线的。

以奴隶社会为例。据现存大量资料证实，中国古代奴隶制的确具有东方型的特色，应归属于马克思提出的“亚细亚形态”（即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）范畴。在恩格斯的论述中，有时又称为“亚细亚的奴隶制”。（《英国工人状况》）这个形态的特征，主要表现为土地王有、村社分治、族权隶属和贡纳剥削等几个方面，迥异于西方古典的劳动奴隶制。这种社会形态早在马克思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》中就进行了精辟的阐述，表明所谓“亚细亚形态”正是古代奴隶制的常轨形态之一，不应划出“五阶段”范围以外。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。

遗憾的是，关于“亚细亚形态”问题，从三十年代起，就在苏联学术界引起争议；到五十年代中期，论争扩大，我国也被卷入；直至六、七十年代，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全面交锋的热潮，各派意见的分歧愈来愈复杂，逐渐陷入失控状态，出现了“亚细亚形态”同“五阶段”程式对立起来的思想暗流。

众所周知，马克思在生前，限于时间、精力和条件，在阐述“亚细亚形态”学说时，还不可能在掌握足够的文献资料上，象对待古代印度那样来理解中国当时的特殊国情，从而作出全面、深入的调查研究。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，从而得出一系列科学的新解答，正是一个蕴含无限开拓潜力的研究课题，而这项相当艰巨的任务，当前正落在我们从事古史研究者的肩上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我在五十年代中期，结合教学的需要，决心打开这道难题的闸门，针对马克思提出的“亚细亚形态”问题，以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》为轴心，广泛涉猎有关的经典著述和学习资料，试图以剖析农村公社的过渡性质入手，初步考察我国古代奴隶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，体认到由此而必然引起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。在研讨过程中，我兴奋地发现：马克思、恩格斯所反复揭示的古代东方型的奴隶制特征，不论在经济、政治和文化方面，都和我国当时的历史实际颇相吻合，可从文献、文物两重印证中得到较好的说明。

通过这一探讨，坚定了我的信心，突破长期存在着的井田、乡遂、都鄙之迷，领会到作为“村社之父”的早期国家统治者，和作为“普遍奴隶”的“众”、“庶”社会身份，进而判明当时宗法隶属关系的典范性。我还连带注意到春秋、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的历史动向，企图通过发展的土地所有关系（包括小农经济、大土地所有制），从基础变革环节上，追踪我国奴隶制宗法向封建制宗法过渡的一线信息。这些研究心得，记录在我所发表

的《试论农村公社的过渡性质与中国农村公社的发展》（载《南京大学学报》1956年第4期）、《试论西汉时代的小自耕农经济》（载《江海学刊》1960年第1期）、《试论汉唐间的封建庄园制度》（载《历史研究》1961年第1期）、《有关周代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》（载《江海学刊》1963年第6期），以及后来整理发表的《从我国古史传说看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的过渡》（载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8年第1期）等论文中。还有不少研究资料和一些写好的学术论文，都在“文革”中散失了。这对我个人来说，不能不说是沉重的损失。

就在这前前后后，我除讲授几门基础课外，还根据实际需要，给高班同学开出一门断代史——魏晋南北朝史，并写了一份讲稿。在编写教材时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在我国民族大家庭里，每当中原王朝政治失控之际，在各族统治者的野心煽动下，不知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，才出现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，造成无法估计的内耗损失；也不知经历多少苦难的岁月，才激起各族人民的正义觉醒，再次酝酿成和平相处的条件，把历史主流引向新的民族大融合。这个摆在眼前的严峻课题，迫使我不得不积极加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理论学习，从难以数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，尝试着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，努力掌握新的知识。

以后不久，按照教育部规定，必须为高班同学开中国史学史这门选修课。我在推卸不了的情况下，认领了这项任务。由于以前对这门学科研究不多，我只有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如金毓黻、陆懋德、方壮猷、朱希祖等人的著作，翻阅当代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题论文，同时参阅范文澜、郭沫若、翦伯赞、吕振羽等革命前辈的著作，编写教材，把这门课的教学进行到底。

但是，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冲击，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，有时甚至连生活也无所着落，各项研究工作被迫处于停顿状态。

四

一直到1978年，我才最后摆脱十年“文革”的严重影响，恢复了正式工作。可我当时已年近古稀，精力大不如前。每一念及这么多年来虚掷光阴，碌碌无成，在扼腕痛惜之余，时刻提醒自己今后还有一段时光千万不要再磋砣下去。我日夜思量着：如何珍惜这有限的精力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，选定一个研究方向，多少做出一些成绩来。恰在此时，系里敦促我尽快确定方向，提前招收两名硕士生，并准备立即上马。确定一个研究方向，这需要经过慎重的抉择。后来考虑到主客观有利条件，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先秦思想史这个点上。现在追想起来，促使我当时作这一选择的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

（一）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，功利意识浓，和哲学史不一样。从历史系提出这个研究方向，的确比较合适。国内在这方面着手的还不多，在某种程度上寓有开拓意义。

（二）思想史是传统文化的主心骨，边缘性强，接触面较广；先秦诸子之学又是它总的源头。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，当时出现的“争鸣”形势及其相互制约、相互渗透的影响，形成千载一时的壮丽景观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铸就了深厚的根基，对当前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具有借鉴作用。特别在“文革”中这一学术领域受到严重的玷污和扰乱，迫切需要从正本清源上作一次系统的整理。

（三）就主观条件说，我在家塾和学校教育环境下，对先秦史籍、文献阅读较多，下过一番功夫，心里有个底。现在有机会系统地温故知新，觉得父亲对我的哲理启迪，大学讲坛上老师对我的殷切教诲，都足以提示我再接再厉，开动新的思路。再想这些，就是祖父要求我的死记硬背，也不失为必要的资助。

（四）我在五十年代对“亚细亚形态”的研讨，虽没有继续

深入下去，至少已开始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，对我国奴隶制基本上把握了一些要害，有了一定的论证基础。到七十年代中期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参加了《韩非子新注》一书（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）的审稿、定稿工作。在将近一年中，与大家一起琢磨字句、商量学问，为全面研治先秦学术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

为带好研究生，我动了不少脑筋，反复展读了教育部历次下达的有关文件，体会了党报、学刊上关于人才培养的文章，参考了前辈和同行们的经验，结合自己的设想，我确定在两年内，开出三门课程。在理论课方面，配合学校的公共理论课，增设一门经典著作选读，通过讲授和自学相结合的形式，提高教、学双方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能力。在专业研究方面，先后开设经子选读和先秦思想史两门课程，力图在学习原始思想资料先走一步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全面安排进入主课的步骤，摆正有机体系中各个环节，做好必要的配套准备。同时，还讲授一些文献学和目录学知识，并要求学生学古文字学。

经过反复选择，我决定采用恩格斯的《反杜林论》为经典著作教材。因为这一著作是十九世纪德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的产物，在学术领域接触面广，交锋点多，批判力强，从边破边立中揭示出显明的对立面，在史论结合的方法论上，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。在讲习中，广泛地联系古学和新学中的一些问题，参阅其他经典著作（如《自然辩证法》、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、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等），要求各人做好心得体会。有的同学还下了较大的功夫，投进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去，写出成本的学习札记。这样的安排，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，自觉地运用史论结合的原则，探讨历史问题，不无裨益。

在经子选读这门课中，我从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到《左传》、

《国语》、《礼记》，先撷取部分精华进行了讲析，走了一个小巡回，理了一个头；再以儒门《四书》开始，把学习重点转向先秦诸子之学，进入课程的主要部分。我要求学生时刻牢记顾炎武那“只管开山取铜、不拣废铜烂铁”的治学精神，在研究各家各派思想学说时，必须从头到尾通读全书的“白文”（即原文，不加注），严格杜绝断章取义的不良行为。力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，在整体结构上掌握全书的内在联系，把宏观的战略意图和微观的战术效用结合起来，从而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。至于章句训诂的知识，只须选用公认为较好的注本（最好是会注本），不提倡费过多的精力去搞烦琐考证。

对于先秦思想史这门主课，我决定沿着既定的顺序，从系统中突出重点，尽可能地援引讲习过的材料，作出自我印证的解析。后来发现这样讲下去，不利于发挥年轻人的独立思考，便决心立即改弦更张，将课程分成十个专题，指导学生自己动手，作好材料准备，写好发言提纲，发扬学术民主，定期进行讨论，并在需要时进行指导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如果说在专业教学实践上，我尽力想做的，只是古人说过的“导而弗牵”，那么，在指导学位论文时，我所孜孜以求的，则是“开而弗达”（见《礼记·学记》）。这里所谓“开”，是拨开选题的思路，敞开材料的门径，撇开不必要的顾虑，亮开道道必经的工序，要求同学们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式，独立思考，精心做好自己的毕业设计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搜集资料，拟定提纲，完成论文。几年中，我所带过的研究生，均以此方法，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他们的学习任务。

在带研究生的同时，我还利用一切空余时间，从事研究工作。我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，把长期积存下来的关于先秦诸子之学的知识和见解，凝集为现实需要服务的笔尖上。大约五年当中，我陆续整理出一些新的端绪，发表了《还原子产的历史地位》

(载《南京大学学报》1977年第1期)、《法家学说形成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》(同上,载1979年第1期)、《论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》(载《历史研究》1977年第2期)、《关于孔子的重新评介》(载《中国哲学》1979年第3辑)、《论墨家学派的人民性》

(载《群众论丛》1980年第3期)近二十篇论文,并选编成《先秦诸子初探》一书,于198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在此书中,我就先秦诸子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,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,几乎涉及到先秦诸子的各家各派,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。同时,在此基础上,我还拟定了《先秦诸子续探》、《先秦思想史纲》等书的编写提纲,争取尽早完成、出版。

限于我的学诣水平和目前的身体状况,这些研究成果显得还很不够,尚待进一步深入。但即使这样,已注定了我不能再走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或《诸子考索》以至《诸子平议》的老路,只有踏着自己的脚印续探下去。

五

我研治中国古代史,迄今垂六十年,专业爱好至老不衰。在青壮年时期,喜浏览名人传记,稀罕掌故,每读到民族精英与爱国之士的壮伟事迹,辄为之掩卷神往。中年以后,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,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治学方法,紧沿史论结合的途径,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我国历史上劳动群体的杰出贡献上。特别对于先秦时期“百家争鸣”这个重要课题,进行了系统的研讨。在研究中,我深切地体会到:要想在这个领域进行开拓性的探讨,还必须着重宏观的战略考察,认真落实,整体部署,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同当前建设精神密切结合起来。举其荦荦大者,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郑重一提。

(一)必须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,依据生动的社会变革实际,和足以印证的文献、文物资料,在宏观的历史考察下,判明

春秋、战国之际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关键所在。在亚细亚形态范畴中，我国古代社会实际表现为宗族奴隶制。从“五常”到“三纲”，集中反映了奴隶制宗法向封建制宗法的转变线索。就伦理关系说，前者以宗族为中心，关系是相对的；后者以家族为中心，关系是绝对的。正象废井田、兴名田一样，标志着新陈代谢的必然性。离开这样的宏观考察，任何微观的论证也会失去其前提。

（二）我国自古以来，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。先秦时期也不例外。在宏观的历史考察下，各民族创造的文化，都具有各自的特色，反映不同的心理素质，又在长期交往中（包括战争与平时时期）产生复杂的渗透和混合关系，构成新的发展形态。从原始公社起，历经夏、商、周三代，直至秦朝的统一，真正控制历史舞台的，不只是中原华夏族一系，而是它和东方“两皞”（太皞和少皞）族之间互相代嬗、互为消长的过程。就说炎、黄联盟吧，在它的内部，也长期存在着互争雄长的局面，不好说有单一的绝对优势。从史论结合上看，我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是多元的。这在思想史研究中，不能不引起新的觉醒。

（三）由于我国幅员广袤，山重水复，各族错居杂处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。从方言、习俗到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各方面，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也形成天然的歧异，表现为各自独有的优势。到春秋、战国之际，又因割据、兼并形势的变迁而愈加复杂化，其中优势较大、国力较强的、就不断巩固和扩展自己的阵地，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吸取和融合外来的文明，发展而为特定的典型。在宏观的历史考察下，这些情况的存在和发展，必然表现为地区文明的多型性，焕发出精神活力。这就决定了在先秦诸子之学的思想领域里，也必然要派生出旁支别系，呈现出杂采纷陈的动人景观。如稷下之儒不同于洙泗之儒，稷下之道不同于老庄之道，稷下之法也不同于商君之法，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如何以史论

结合为准绳，来衡量各地区相互辉映的文化成就（如中原文化、邹鲁文化、燕齐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巴蜀文化等），进而探求各自的思想体系和特征，这不仅具有开拓意义，也必将给马克思主义本身提供强劲的论证威力。

（四）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，从思想学说方面来看，当正式溯源于先秦诸子。作为儒家学说的缔造者，孔子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，又用传习的方式向社会继续扩散，起了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。在宏观的历史考察下，孔子的思想学说有承有创，现实功利性强，人才教育作用大，蕴含着时代的精神活力，凝结为古代东方文明的典范。他的社会实际身分只可能作为“布衣之士”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先行者，决不是什么“双料贵族”。今天评价孔子，似应以此为出发点，否则是不公正的。孔子死后，弟子们各据心传，授徒讲习，一时号称“显学”。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又迭经多次变迁，以不同程度的作用，支配了中国历史二千多年，影响远及国界以外。这一传统文化的积淀作用，在先秦诸子之学中是无与伦比的。所产生的某些作用，影响到整个民族心理的成长，很难在短时期内给以清除。如何结合当前的改革形势，以史论结合为准则，制定正确的战略部署，从全面的批判继承中，把它从自我失调以至失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，离开宏观历史考察，是无法进行下去的。

（五）同样地，如何结合当前开放政策，高屋建瓴地对待中西结合问题作出正确的妥善安排，也离不开宏观的战略考察。事实表明，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，到春秋、战国时期，曾一度进入繁荣兴旺，至今仍有不少资料（包括农学、医学、纺织学、天文学、物候学、地理学、数学、力学、光学、机械制造学等）没有进行综合整理，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。特别在中医学方面，当时就名医辈出，有不少专著问世（如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素问》）。

秦汉以后，丝绸之路大开，著名的四大发明相继西传。只是到了封建后期，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，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。曾经，外来的商品如潮涌进，几乎形成席卷之势。在宏观的历史考察下，从中体西用、筹办洋务、实业救国，到提倡全盘西化，对于如何结合西方物质文明来改造东方旧世界、解除现实的民族危机问题，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，都不可能做到对症下药，得出确切的科学回答。在意识形态领域上，经过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到胡适、梁溟漱等人，对于中西文化结合所提出的主张，很快地遭到了实践的否决。事实表明，离开革命的实践活动，就连“五四”时代大讲“新学”，提倡“科学与民主”精神，以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，在过去流逝的岁月里，也同样会受到无情的冷漠，到十年“文革”中而渐灭殆尽。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只有把“古为今用、洋为中用”尽可能地整体联系起来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搭起一座中西结合的巨型桥梁，才是正道。任何传统文化既然不是多元的，因而任何超传统的文化结合也是可以预期的。

（六）最后，想回到本学科上，作一些补充说明。研习先秦之学，汲取这个源头活水，以滋润后来者的作用，宏扬祖国文化传统，既要通晓当时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形势、大气候，又必须严格掌握各个不同地区独立发展的小形势、小气候，充分注意到历史进程的不平衡性。从横向联系看，离开宏观的历史考察，就无法理解同一学术流派可能在不同地区产生变异的功能，反映不同的功利要求。从纵向发展看，离开宏观的历史考察，也难以说明各个学术流派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和演变动向。而纵横交错之间，又必然要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影响，隐含有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。凡此种种，都迫切需要人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在史论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上扎扎实实地下功夫，才可望真正趋于有成。

我自问平生在专业研究上，不论对古学还是新学，都没有打下深厚根基，每读《庄子》“生也有涯而知无涯”（《养生主》）这一警句，辄不禁感慨系之。但也同时自幸：我从上辈和前辈们那里，曾经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，积累了一些经验、知识。特别是建国以来，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，我自觉地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初步探索了史论结合与宏观和微观研究的一些治学门径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1986年10月，组织上又重新接受我入党，使我深深感到有生之日，即是向革命事业报效之时，即使现在已经退休，遇到的困难再大，也不容随便放松自己的脚步。

1988年5月

本文是根据作者原稿，由全根先整理而成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

中华书局标点本《史记》校点正误一例

卷十五《六国年表》魏文侯十七年（前408）：“击（宋）〔守〕中山。”“击”标人名线，“守”校改为“宋”。而集解云：“徐广曰：一云击宋中山。”既曰“一云”，则知表中语非“击宋中山”。又卷四三《赵世家》云：“烈侯元年（前408），魏文侯伐中山，使太子击守之。”益知“守”字不误，不当校改为“宋”字。再者，既改“守”为“宋”，则“击”已为动词，不当加人名线。

• 马斗全 •